

商 俗 韵

《金瓶梅》中的女人们

曾庆雨 许建平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商
风
俗
韵



《金瓶梅》中的女人

曾庆雨
许建平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风俗韵:《金瓶梅》中的女人们/曾庆雨,许建平著.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ISBN 7-81068-166-4

I. 商… II. ①曾…②许… III. 金瓶梅-女性-人物-文学研究-中国 IV. 1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602 号

商风俗韵——《金瓶梅》中的女人们

曾庆雨 许建平 著

责任编辑:冯 峨

封面设计:丁群亚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93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500

*

ISBN 7-81068-166-4/I.78

定价:19.60 元

目 录

- 一、 第一部写女人世界的书（代序） (1)
- 二、 晚明思潮与人性的张扬 (7)
- 三、 市井商风与女性价值观念的变异 (12)
- 四、 裙钗队里的人情世理 (17)
- 五、 有无之间说说“性” (23)
- 六、 不甘失落与不择手段
——潘金莲自尊与自悲意识分析 (33)
- 七、 难耐寂寞与生命寄托
——情爱，子女：李瓶儿的两大生命线 (51)
- 八、 卑贱与高傲的结合
——庞春梅睥睨裙钗的心理透视 (71)
- 九、 主妇难为
——吴月娘两难心理谈 (87)
- 十、 务实智慧
——孟玉楼的婚嫁观与处世谋略 (103)
- 十一、 凄楚苦痛的背后
——孙雪娥悲剧人生谈 (119)
- 十二、 可嬉不可欺
——宋惠莲的自尊意识 (133)

- 十三、本性难移
——李娇儿：环境造就的烟花娇子…………… (148)
- 十四、顶窝补缺
——如意儿求安心理分析…………… (157)
- 十五、钱财就是灵魂
——王六儿的生存方式…………… (168)
- 十六、房帙中纳贤
——林太太寻找失去的贵夫人心理…………… (184)
- 十七、人生怎奈何
——西门大姐：家庭利益的牺牲品…………… (192)
- 十八、唯利是图人的权势心态
——倚势谋财的李桂姐…………… (204)
- 十九、情场的智谋
——青楼中的智多女郑爱月…………… (211)
- 二十、逢场便做戏
——上下通情的贵四娘子…………… (218)
- 二十一、劝善背后
——身怀绝技的薛姑子…………… (225)
- 二十二、婚爱悲剧的导演
——王婆：为财而谋的马泊六…………… (233)
- 二十三、为人奴者
——奴大不欺主的小玉…………… (241)
- 结束语《金瓶梅》：一个关于“善”的寓言…………… (248)
- 后记…………… (254)

一、第一部写女人世界的书（代序）

《金瓶梅》是一部旷世罕见的奇书。近些年来，人们对该书之“奇”，谈论得很是热闹。这部小说确有不少“谜底”和“功绩”，仅就它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贡献而言，满可以集成一本不薄的册子。然而，当我们提出它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集中笔墨，倾其才华来展露女人的群体生活和心理隐秘，有意识地写女性的书时，却往往被视为一种很新鲜的说法。其实，从书名由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人姓名中的一字汇成，就明显地表示了该书不同于史传。它是专注于女性的创作旨趣，从而向读者开启了一个久被遮掩的“女人国”的叙事天地。

《金瓶梅》在人物的组合上是以西门庆为原点，辐射整个晚明社会的方方面面。兰陵笑笑生着力于描写的，是与西门庆关系最密切的家庭成员。可奇怪的是，由西门庆创建起来的偌大府邸中，既无他的父母、叔伯，又无他的兄弟、姊妹。围绕在他身边的，全是些“花枝招展，绣带飘飘”的女人——妻妾、丫鬟、媳妇、奶子，以及妓女、暗娼、尼姑、媒婆等。从而构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女人国”，犹似《红楼梦》中的“女儿国”一般。如同大观园女儿国中的男主人贾宝玉所交往的男人，无不与女儿们有着这样和那样的关系，“女人国”中的西门庆也是如此。他所交往的男人，除官吏外，多数来往于这群女人中间。作者如此安排他笔下的人物，目的很明确，意在方便展现女人的生活世界。

在这部洋洋近百万言的巨著中，花费笔墨最多的是女人故事，写得最精彩的是女人故事，写得最悲切的还是女人故事。作者的创作意图正是借助女人们的故事表达的。而在此以前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则更多地是描写男人们的故事，歌颂英雄们（不外历史英雄、草泽英雄和神魔英雄）的丰功伟绩。女人被淹没在男人辉煌夺目的光芒之中，难以摄入描写视野。即使不得不偶尔染笔，女人也只是充当炫示男子汉气概的衬料，英雄多情的附饰品罢了。但自《金瓶梅》出，写女人的作品多了，并产生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可见其影响不小。的确，世界本来就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作为对生活进行关照与折射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男与女本应有同等的篇幅。不难想象，中国的叙事文学如果没有了《金瓶梅》这部第一次集中笔墨描写女人生活的书，没有了女人的故事，失缺了对女人情感世界的描述，将会怎样的寂寞。

从人类形成社会以来，女人的世界犹如男人的世界一样丰富多彩，女人的生活与男人的生活一样复杂玄妙。尤其在对待性欲、爱情、婚姻、子女等问题上，女人比男人更敏感、更看重，也更珍惜。因为，与男人相比，这些问题构成了女人生活内容的主旋律。可这些涉及人类情爱的问题颇令人头痛，这是一个很难解决好的世界性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任何历史阶段，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力求处理好这些问题，但直至目前仍不能说已经找到了完美的答案。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酒神”精神，形成了以性欢乐为基点的婚恋观。“性解放”与“性自由”的提倡，使得婚姻、家庭关系格外脆弱。于是，出现了如下状况：青年男女或者对婚姻问题十分谨慎，犹如对有疑问的商品进行选购似的，一个个的试来试

去，直到自以为可意为止，对于是否贞洁如处女，倒并不怎么要紧；或者男女双方聚散匆匆。他们的婚爱史犹似《三国演义》开篇所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者夫妻双方对对方来说，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招牌罢了。各行其是，各有新欢，互不为怪；或者视婚姻同桎梏，超然于外，终生不婚，也无须承受子女、家庭的责任。可以随意不断地改变同居对象，而对其行为的解释是：你需要一杯牛奶，买好了，何必再去养牛挤奶呢？再或者搞“团体结婚”，晚上交换配偶，大家平等。……这种婚姻对男女来说确是自由、满足了，但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很严重。诸如：子女教育问题，私生子问题以及失业、酗酒、吸毒、性病、暴乱等等。其弊端之大，难以誉之为“完美”。

在中国，婚姻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之上的。婚姻被视为不可离异的伦理关系，犹如父与子一样。这种婚恋观的确维系了家庭关系的稳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但它是牺牲个人、特别是女性的情爱自由为代价的。尤其在封建时代，婚姻关系强调“门当户对”，造成了大量家庭利益大于个人爱情的“唯利是图”的婚姻悲剧。这种婚恋观对个人的情感十分漠视，不允许人有选择的自由。尤其对女性贞操的过分看重，甚至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度。把能否守节，特别是为死人守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种重死不重生，重节不重命的伦理道德观，使人的合理情欲受压抑，美好的爱情遭扼杀。所以，这一传统的婚恋模式也不足取。

中国社会曾有过“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这充分表现出对女性的性歧视。一夫多妻制，为男人性欲的满足提供了方便。（当然，一夫多妻制，不仅是富贵人家的专利，生活较差的也如此。如《孟子》中“一妻一妾”，男人穷得讨饭吃，还有两个女

人依附他。这或许与那时“女人多于男人”的性比例失调有关),如果妻妾不能满足性要求,还有补救办法,即到妓院做嫖客。妓院的女人,是专门为有钱的男人准备的。但是,男人的性满足是以女人的痛苦作基础的。“一把茶壶四只碗”的性搭配关系,造成家庭中的女人们几人欢喜几人忧。更由于女人一生的意义取决于她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一旦受到丈夫的冷落,也就意味着她一生的完结。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很悲惨的,至少明清时代如此。

新中国建立后,妇女取得了与男人相平等的权利。一夫多妻制和妓院也随之被取消。婚姻制度发生了质的突变与飞跃。以男女恋爱自由为前提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毋庸置疑,这一新法既维系了家庭关系的稳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男女情爱的实现。但“婚姻制度永远没有完美,那是因为人性永远有缺陷之故”。而对人性中种种缺陷的展示和批判,不正是文学应担起的责任吗?

所以,《金瓶梅》不仅是一部着意描写女性群体的书,而且也是一部广泛探讨女性性爱、婚姻问题的小说。这种探讨是通过人物形象自身的婚爱行为和作者所持的态度来表现的。由于作者采用的创作手法是写实,因而作品中人物对性爱、婚姻的看法异常大胆真率,犹似作品中的性描写一般。且又因人而异,呈现为不同的观念类型:有的视婚姻为获取心理平衡和生理满足的方式。情爱的表现就是尽情泄欲和“把拦汉子”,以此作为爱情失意的补偿和取得家庭中生存势力的手段(如潘金莲);有的把男人是否能满足自己的性需要视为爱情和婚姻的基础。只要能做到“像医奴的药一般”令己可意,便可舍弃一切,把全部身心奉献出来(如李瓶儿、韩爱姐);有的把性关系作为一种筹码,以此

来寻得自身地位身份的改变，一旦达到目的，婚姻中性关系的专一性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如庞春梅）；有的看重以婚姻做为保障的性关系，并认为女人在失去丈夫后，有权对自己的婚姻作出选择（如孟玉楼）；有的把性关系视为极其神圣的东西，看作是维护家庭夫妇感情的重要手段（如吴月娘）；有的把性关系视为利益交换关系。性，沦为有价可售的生财之源，并以此来改变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以“输身”来“借色谋财”，甚至幻想着进入大户之家，挣个小妾位置（如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以及李桂姐之类的妓女）；还有的“唯性是图”，丧失了礼仪廉耻，不顾伦常道德，只一味追求自己的感官满足（如林太太）。作者面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婚爱行为和性心态，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既有对真诚与善良的褒扬，也有对丑恶和无耻的针砭。在揭示晚明的女人敢于冲破传统的婚爱模式，以更具时代性的观念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导时，赋予了她们的言行以合理的内涵，表现出对女子自主婚姻、寡妇改嫁等进步婚恋观的称赞。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金瓶梅》对妇女的爱情、婚姻及性问题的探讨，不仅较为全面，而且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是以前的长篇小说所望尘莫及的。正因如此，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分析讨论，便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意义，更多关注女人的社会心理特质。

我们希望此书能使人们透过《金瓶梅》中形形色色的女人，看到这些被称为“第二性”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了解女性在东方文明大国的发展史中身心曾经历的“炼狱”。希望通过她们百媚千姿的音容笑貌，进入她们奇异迷离、惊心动魄、令人目眩神摇的故事。让那些熟悉又五光十色的世态人情，那些道不明说不清的人生谜底，那些感人迷人的生命绝唱，能随着那一一张张书页

的翻动，一一呈现在您的面前，久久激荡在您的心间，使您得到美的愉悦，激起您对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更希望此书能使您真正认识《金瓶梅》的价值，看到它是我国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是我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书。

二、晚明思潮与人性的张扬

中国社会以其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耕文明,建立起了一个以“仁”为根本,以“孝”为核心,以“忠”为表征的宗法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忠”、“孝”是传统伦理思想中最突出和最基本的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基本是由此引申和派生出来的。就“忠”与“孝”而言,是先孝后忠。人首先具有孝父母之心,懂得孝列祖列宗之“家道”,尔后才会有孝的行为表现——忠。因此,“忠”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具体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并被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和判断人之善恶的普遍标准。以儒家忠、孝传统伦理思想为规约个体行为道德的要求,便是人人皆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道统对个体道德观念的具体要求,其体现了个体道德追求与价值实现的演进过程。四者之中,“修身”为本。因为它是个人实现道德自我完善演进过程的出发点,所以人人皆应为之。其目的是使人建立稳固的道德感,在自我修养的同时,产生出一种自觉的对社会及他人的责任感和道德行为标准认定。道统的代代相袭,形成人们以“道统”的眼光、以“道统”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人情世故。对社会诸多事物的认识和评判,往往不以合不合规律为圭臬,而以合不合道德来判断。这种以道德为人生价值取向的思想意识,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时代。当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中期后,传统的道德价值评判观念渐

渐起了变化。由宋以来形成的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嘉靖以后,“社会的繁荣和封建政治的腐朽交织在一起,情况日益复杂起来。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出现了许多城镇”。这些告别了传统农耕生存方式的“城里人”,自然要适应新的“生态环境”。频繁的商业活动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加大了信息量,产生了新观念。生活节奏的加快,或多或少地消减了传统宗法伦理对他们的制约。再有,商业贸易的操作特性,改变了以往农耕生活对集体的依赖性。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个人对机遇单刀直入的把握,甚至个人去创造某种机会的创造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从客观上给个性发展带来极大的好处。经济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在经济空前发展的同时,由新的生活方式产生出新的生存意识,势必引起对传统文化建构、精神信念、价值追求、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多个领域的突变和革新。这种变革常常以思想文化界为首起,以世俗大众为落实。而且变革一旦出现,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总会引起社会在新旧观念、价值判断、生活道德选择等方面的激烈矛盾和斗争。

明中期以来,以陆象山(1139—1193)、王阳明(1472—1528)首倡“心学”,主张“心即理”。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与李宰》,《全集》卷十一)所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王守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陆、王学说的提出,在当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南宋末年始,程朱理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到明代,被教条化、绝对化的理学教义几成国教,严重地窒息了人们的思想。那些表里不一的理学家们,养成“外面做的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的言行痼疾。对此“心学”认为“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去掉不正之心,遇事遇物就自然合于道理。陆、王思想敢于不以理学的是非为是非,而把人自己的“心”即

“良知”作为准绳,这不能不诱发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叛逆。这次哲学思想理论上产生的分歧,使理学受到严重冲击。唐寅、徐渭等一批文人,更进一步以他们的言论及创作实践,对这种怀疑和叛逆的思潮在社会上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肯定人的“本心”、强调人的“本我”价值、注重个性表现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历史上又一次“以人的觉醒”为主旨的社会变革思潮。

到晚明时期,李卓吾(1527—1602)进一步提出“童心说”。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他一针见血道出当时的所谓理学家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李贽《焚书》第98页、第48页),不过是些“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续焚书》第76页)的衣冠禽兽;他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论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人欲即天理”,对人性中本能而合理的欲望给予肯定。他不仅对理学中的反人道思想进行有力的批判,也对世代相传的孔孟之道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提出怀疑。认为即便是出自圣人之口的话,也不能当作万世之论。因为“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就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也。”(《焚书》第99页)李贽这些见解十分精彩。确实,任何理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当成教条而任意套用。李贽的学说,对于桎梏在寻章摘句,皓首穷经,却缺少独立思考的晚明学术界,无疑是一次思想的解放。

李贽的思想和学说,对袁宏道等一大批文人产生了很强大的影响。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更以他们的文学创作及其言论

行为,表现出这一极富叛逆色彩的思想解放。这种注重人的个性和价值的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相结合,互为声气,势必形成为一股颇有声势的社会潮流。而晚明社会的新兴市民阶层,以其充满勃勃生机的创造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生活方式。在城市商业经济“催化”作用下,市民社会具有对生活享乐的要求。这种以享乐为主旨的生活追求,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对个人利益的漠视和否定。在对儒学“修、齐、治、平”的传统人生理想进行修正与背离,对固有的道德和价值理念产生着严重冲击的同时,也生出了对新的道德价值理念、新的人生理想的渴求。对此,文学和戏剧,作出了多维的表现。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著名戏剧作品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白话小说有以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作品。“三言”,即《喻世明言》(初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初刻和二刻《拍案惊奇》。这些作品,对当时的思想和生活作出了富有代表性意义的积极反映,艺术成就也最高。作为对程朱理学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极端轻视个体生命价值,压迫人的本性思想的反拨,不论是陆、王“心学”还是李贽的“童心说”,都有其尊重个性,强调人的价值存在的积极意义。这也给晚明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新意。从汤显祖笔下杜丽娘的“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到《金瓶梅》中西门庆所言的“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都不难看出对人的本性合理性的充分肯定。强调个性张扬,追求自我的实现,注重功利人生的价值取向,几乎成为晚明人的普遍心态。

但是,进入末势的晚明社会,有着太多无法清除的积弊,有着太多此起彼伏的社会危机和内忧外患。李贽的被捕并在狱中惨遭迫害致死,成为晚明政治黑暗的明证,其在社会各界引起的震动与

他的学说一样广泛。然而,李贽的悲剧,并没有使得那个时代或社会有所清醒。很多人,甚至与李贽很是相熟的弟子和友人,也对李贽的以死明志,以死抗争的行为含义,不大明了。同时,李贽之死,也给了以袁宏道为首的大批激进文人一个沉重打击,使才刚一露头的“人的觉醒”思潮因被釜底抽薪而没有了结果。对个性的张扬,其时还只是一种萌芽,就被踩踏了可能拥有的生命勃发。社会的主流还是传统儒学的一家独唱。思想的“夹生”必然导致精神的倾斜不稳。其时的人们既背负着传统道德制约的重压,又难从充满诱惑的现世利益追求中退步抽身。既乐于接受享乐生活的浸染,又不能从新的观念中找到生命意义体现的希望。对个人利益过分的执着,对功利的刻意追求,使得晚明市井社会急剧走入了一个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的社会。理性的失缺,导致人惟有在“财、色”中显身手,在“酒、气”里找慰藉。而文人们在面对个体自觉后的狂放不羁感到无所适从的同时,对于功名利禄的现世性追求也丧失了评判的依据。这种“茫茫古今混无赖”的两难选择心态,在《金瓶梅》中得到很是全面而本质的反映。

在那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能像《金瓶梅》这样对人性与社会问题诸多方面作出全景式描写的并不多见。《金瓶梅》是多层次(从九五之尊的皇帝到三教九流的贩夫走卒)、多侧面(有政治、经济、官场、商场等)、多角度(官文化、商文化、儒、道、释文化等)地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立体的反映和揭示。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实属空前。而且,能从深层次上对晚明个性张扬与“人的觉醒”思潮进行颇具意味的思考,反映人们其时生存的苦闷感与困惑感的作品,也当以此书为首。正是有这样的思考与反映,才有了笑笑生笔下一个个人物鲜活的生存态势与命运走向。

三、市井商风与女性价值观念的变异

女人，在人类走入文明的进程中，曾是可怜与卑微的同义语。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女人都是“第二性”的，是男性的附属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的附属性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典籍里，变成了一种“万世定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出自《周易大传》的话，已经昭示了女内男外的家庭分工和社会角色定位。既是天地间的“大义”，也就是一种代表天意的乾坤定数，成为千百年来男人对女人的普遍共识，也是女人的自我认识。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全然顺从天意，更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体现这天地间的所谓“大义”。明末，扬州、苏州、杭州等东南商镇，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震荡与颠簸后，商业经济重又复苏。冶铁业、陶瓷业、纺织和印染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生产，拥有几十台纺织机的“机户”，遍布苏杭。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市场物资丰富，商品也源源不断流向全国。与此同时，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涌入城镇，成为廉价的被雇佣者。不论是购入商品或是出卖劳动力，都是对人的商品意识的培养，是对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封建经济的打破。而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大量出现，说明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并不断滋长起来。